

821337

238

4026

7-1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

ZHONGGUO XIANDAI ZHIXUESHIGAO

(上卷) 袁伟时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哲学)

袁伟时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哲学)

袁伟时 著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6.625印张 字数666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统一书号：2339·9 定价：4.40元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对象、分期与研究方法	(1)
第一节 现代哲学的整体联系对研究对象与分期的规定	(1)
第二节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制约	(4)
第三节 从思潮和系统发展的角度研究现代哲学	(8)
第四节 正确理解中西现代哲学的统一与差别	(11)
第二章 中国现代哲学的诞生与哲学变革的命运	(16)
第一节 中国现代哲学的诞生	(16)
第二节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35)
第三节 哲学变革的不彻底性及其原因	(56)

第一编 辛亥革命后的哲学思潮(1912—1914)

绪 言	(65)
第一章 维护共和制的哲学思潮	(68)
第一节 民主主义者对共和制哲学基础的论述	(68)
第二节 孙中山对民生主义哲学基础的探索	(79)
第三节 蔡元培的哲学思想	(86)
第四节 章士钊的“调和”哲学	(97)
第二章 哲学教育的改革	(108)
第一节 废止读经及其反响	(108)
第二节 哲学教科书的编纂	(111)
第三章 提倡旧道德与调和东西方哲学的思潮	(121)
第一节 《庸言》与梁启超等的哲学思想	(121)
第二节 尊孔逆流与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134)
第三节 蓝公武和黄远庸哲学思想的新变化	(146)

第四章 汇合释老向王学倒退的章太炎哲学思想	(154)
第一节 曲折的思想历程	(154)
第二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哲学思想	(163)
第三节 转变的根源和归宿	(172)

第二编 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哲学思潮(1915—1919.4)

绪 言	(181)
第一章 陈独秀等启蒙学者的哲学思想	(188)
第一节 早年的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创办	(188)
第二节 陈独秀前期哲学思想	(193)
第三节 蔡元培哲学思想的发展	(202)
第四节 恽代英前期哲学思想	(210)
第二章 关于中西文化的辩论	(220)
第一节 《新青年》派对新文化运动理论基础的探索	(230)
第二节 杜亚泉及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论	(237)
第三节 《新青年》派对反对新文化运动理论的批判	(250)
第三章 关于孔孟之道的辩论	(260)
第一节 《新青年》派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	(260)
第二节 对新道德规范的探讨	(269)
第三节 易白沙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274)
第四节 吴虞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283)
第四章 关于宗教鬼神的辩论	(295)
第一节 灵学会与《灵学丛志》对鬼神迷信的宣传	(295)
第二节 《新青年》对鬼神迷信思潮的反击	(305)
第五章 李大钊前期哲学思想	(313)
第一节 早年的经历与哲学和政治思想	(313)
第二节 为再造中华服务的宇宙发展观	(321)
第三节 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彝史观	(335)
第四节 自然真理论	(340)
第六章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	(345)

第一节	自然和社会的进化	(345)
第二节	唯物主义的“知难行易”说	(354)

第三编 五四运动与哲学发展的新阶段(1919.5—1920)

绪 言	(365)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	(369)
第一节 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李达钊等民主主义者的转变	(36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基本状况	(391)
第三节 问题与主义讨论中的哲学斗争	(401)
第四节 社会主义大讨论中的哲学斗争	(409)
第二章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哲学思想	(424)
第一节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概况及其哲学思想的特点	(424)
第二节 吴稚晖的哲学思想	(437)
第三节 朱谦之的哲学思想	(447)
第四节 黄凌霜区声白的哲学思想	(469)
第三章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胡适的哲学思想	(481)
第一节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481)
第二节 胡适的实用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	(494)
第四章 国民党人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518)
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孙中山等的思想变化	(518)
第二节 胡汉民的哲学思想	(523)
第三节 戴季陶的哲学思想	(542)
第四节 朱执信的哲学思想	(557)
第五章 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变化	(579)
第一节 《科学》杂志与任鸿隽的哲学思想	(579)
第二节 王星拱的哲学思想及其转化	(592)

第四编 新文化运动分化中的哲学思潮(1921—1927)

绪 言	(620)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传播及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开端	(623)
第一节	瞿秋白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传播	(62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开端	(645)
第三节	探索和失败中的经验教训	(661)
第二章	“东方文化”救世论与梁漱溟的哲学思想	(676)
第一节	“东方文化”救世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性质	(676)
第二节	梁漱溟的早期思想	(681)
第三节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687)
第四节	反对“东方文化”派的联合战线	(704)
第三章	“科学与玄学”论战	(713)
第一节	张君勱对自由意志论与新宋学的提倡	(713)
第二节	丁文江对玄学派的批判及其哲学思想	(722)
第三节	胡适吴稚晖等对玄学派的批判及其哲学思想的变化	(729)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者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746)
第四章	宗教哲学和关于宗教问题的辩论	(752)
第一节	新佛学运动与欧阳竟无的哲学思想	(752)
第二节	太虚的哲学思想	(767)
第三节	宗教问题辩论中的哲学思想斗争	(783)
第五章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与国民党右派对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歪曲	(797)
第一节	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形成	(797)
第二节	戴季陶的民生哲学	(81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哲学的批判	(827)
附 录		
	研究参考书目	(835)
	人名索引	(836)
后 记		(845)

绪 论

第一章 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对象、 分期与研究方法

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但它的 一个 分支——中国现代哲学史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在我国经历了交织着胜利与挫折的悲壮历程以后，人们正在进行严肃的历史反思。这不能不赋予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本书冀图对改变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荒芜状态有所助益。它以现在的形式呈献给读者，与作者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指导思想与方法的一些想法密不可分。

第一节 现代哲学的整体联系对 研究对象与分期的规定

如何确定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范围？

迄今为止，学者们都是从社会史的分期出发去回答这个问题。我国大多数史学家认为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多年来，无论是通史还是专门史（包括哲学史）都把前一段称为近代史，后一段则是现代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把整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历史称为近代史，而以1949年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两种主张均有言之成理的根据。

本书持的是另外一种观点，即哲学史应从哲学形态本身的特点为研究的出发点，它的研究对象和分期都应据此作出规定。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古代哲学有质的差别的新的哲学观点也在这时开始萌发，发展至九十年代终于形成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开始是两强并峙，后来是三大流派鼎立。由严复开始的一大流派，包括后来的胡适、张东荪、金岳霖等人，尽管他们的基本理论渊源于西方不同的哲学学派，但都以西方哲学为基本架构，融会、改造，用以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力求为科学与民主铺路。康有为开其端的一大流派则走向改造传统哲学为新时代服务的道路，至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现代新儒家学派。那些在佛典和老庄中寻找二十世纪诗情的思想家们的思维模式，大体上也是属于这一流派的。这两大派在中国现代哲学草创时期便并肩崛起。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迅速发展成为进步思想界的盟主，改变了哲学领域原有的格局。这三大流派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中间还交汇形成好些不同色调的支派。

中国现代哲学史理应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各流派发生、发展、兴盛、衰败、斗争、融合的内在规律性。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性质的中国哲学。

所以，本书不赞成用社会史或政治史的分期硬套在哲学史上。一个哲学流派的产生和变化，当然受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制约。但是，它的思想内容常常有内在的难于分割的联系。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完整的哲学形态。它在中国既经历了胜利的喜悦，也饱尝挫折的艰辛；既增添了足以传世的内容，也备受被扭曲的凌辱；而后来的成败往往都可以在前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中找到端绪。如果照搬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分期，以1949年为界把它裁为两截，就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性。

再看看其它流派。戊戌前后的严复与五四前后的胡适，通常分别被视作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美国实用主义两大哲学思潮在中国的代表。可是，考察一下他们分别提出的理论命题和分析这些命题的基本思维模式，其共同点却远远超过了歧异。而这些共同点在其他民主主义思想家身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果硬以1919年为界去研究和编写中国现代哲学史，这种残缺的图景显然难于揭示中国现代哲学思潮的本质和发展。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现代哲学内在的密切联系要求我们从整体上去掌握它们。因此，笔者主张把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今天规定为中国现代哲学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时期。

“现代”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本来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迁的。恩格斯曾经把有别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机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都称之为现代唯物主义。这在方法论上是可供借鉴的。还应考虑到我国学术界一致把产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孔德实证主义及其后的西方哲学称为现代西方哲学。而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发生和发展恰恰受到这些西方哲学的强烈影响。因此，从世界哲学思潮相互关系的角度看，把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称为现代哲学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本书并没有写成完整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而是以1912——1949年民国时期的哲学史为主要内容，对辛亥革命前和1949年以后的哲学发展都只作简要的评述。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主要出于以下一些考虑：

第一、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工作的薄弱部分。在时下流行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辛亥革命前的哲学思想通常都占了较大篇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书试图从新的角度进行考察。至于1949年以后的哲学思想，要详尽地研究，目前条件似未完全成熟。

第二，避免不必要的名词上的纠缠。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近

现代划分的不同意见一时难于统一。中国有按朝代修史的传统。继承这个传统，以民国时期为本书的上下限，有利于内容的相对稳定。因全书份量颇大，又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7)和国民党统治时期(1927——1949)划分为上下两卷。

第二节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制约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一直制约着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思想文化领域同样不能不受这个基本矛盾的制约。如果离开这个根本观点去观察中国现代哲学，往往难于对有关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

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中国哲学常常不是以“纯哲学”的面目出现的。中国现代哲学生长于内忧外患层出不穷的环境中，忧患意识推动着哲学家们更加注意发挥自己的理论的社会作用。中国的现代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救国哲学。这些救国理论的客观效果无疑要联系当时的内外环境进行具体分析。

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制约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判断这些哲学理论的社会作用的标准上。这个标准应该是：凡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理论是反动或错误的，而一切有助于中国的民主、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则都有程度不等的进步性。看来，只要承认社会基本矛盾对哲学思想发展的制约作用这个基本理论前提，就会承认这个标准是难于驳倒的。可是，多年来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出现过一些令人难以信服的观点，这些观点充斥于我们的出版物和大学的讲坛中，甚至被奉为无可怀疑的理论。这些观点的实质正好是不承认或不愿意彻底坚持上述标准。

其中最突出的是把五四运动以后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概宣布为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理论。

五四运动以后当然存在着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理论。形形色色的为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提供根据的理论就属于这一类理论。可是，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不能简单斥之为反动。这一类理论大都贯串着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由于中国人民面临维护国家独立和反对封建意识形态的任务，它们都有程度不等的进步作用。断定这些理论“反动”的根据是什么呢？

其一，“它们提倡资本主义，而这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汇合，资本主义此路不通，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时候提倡发展资本主义都是没有积极意义的。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么一个论断：“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①这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45年通过的政治报告。它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为什么一些思想家在同一时期或更早一些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就非要被视为“反动”不可呢？

其二，“它们不加批判地歌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鼓吹资产阶级民主。”

笔者并不赞成盲目拜倒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脚下，深信人类终有一天会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文明。可是，实现这个理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在于毫无保留地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一切文明都有精华和糟粕，任何有生命力的民族都会认真地鉴别、选择。一切现代民族都应有广泛了解和大胆吸收别国优秀文化的愿望，这样才能使一切文明进步的成果成为人类共同财

①《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61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

富，加速社会发展。因此，对歌颂西方必须具体分析。如果歌颂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那是无可指摘的。要是不加分析地盲目地肯定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东西，则应具体地指出其错误所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同样必须具体地分析。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随之而来的虚伪性，这是人们熟知的。但是，人们虽然承认它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却往往忽视了它还体现着现代政治的观念以及现代社会生活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因而也包含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应予珍视的成果。也就是说，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劳动人民应该批判地继承。因此，对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鼓吹民主的思想家，也不应轻易斥之为“反动”。

其三，“它们反对马克思主义。”

首先应该指出，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看看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不难弄清这个状况。熊十力后期的一些著作甚至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友，努力论证中国人民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合理性。把这些哲学理论划归“反动”，自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确实有些哲学理论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已任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才能彻底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反对马克思主义只能阻滞中国社会的进步。不过，对于这一类思潮还得注意分析它们除了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外，有没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面，同时要分析在某个历史时期哪个方面是主要的。以张东荪来说吧，在三十年代的哲学论战中，他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急先锋，但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的监狱里也是决不屈膝的硬骨头。用简单的公式去处理复杂的社会现象，无非是削足适履。

其四，“它们宣扬唯心论。”

的确，五四以后的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心论。但是，其中也有唯物论。更主要的是唯物与唯心是不能和进步与反动

等同概念的。章太炎曾用佛学唯心主义为民主革命服务，这与熊十力用唯心论激励民族气节反对侵略在性质上是没有 什么 差别的。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及其在中国的学生都用“天赋人权”、人性论等理论抨击封建意识形态。这些理论的进步作用是任何人都难于抹煞的。

总之，只要我们敢于抛弃一些不切实际的概念，充分掌握历史资料，就不难发现，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领域的地位的确立，并没有使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趋于反动。除了少数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服务的反动哲学外，为数不少的哲学理论具有程度不等的进步性质。用一个不尽恰切的说法，这些理论可称之为民主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总目标下，与多种哲学思潮(民主主义哲学)实际上结成了不同形式的联合战线。哲学领域的这种态势，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和阶级结构。

必须指出，从理论形式看，所谓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斗争的理论也是一种难于自圆其说和缺乏彻底性的理论。论者通常都对孙中山哲学思想的进步作用评价很高，而孙中山的主要哲学著作都是五四运动以后才面世的。他们也一致肯定鲁迅在进步思想界的杰出地位，而在1927年以前鲁迅的哲学思想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这样的理论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的两难境地。

这种观点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历史环境的产物。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带来重新审查一切的强烈愿望；“兴无灭资”的简便公式推衍出似乎更准确再现了事物本质的新的历史图景。于是，五四以后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便被判定为反动的。制造或相信诸如此类的理论往往是与对新的理想社会的挚爱紧密相连的。这使一些很高明的学者也受到影响。对这一类历史现象，稍具历史感的人都不难理解和不会苛责。

第三节 从思潮和系统发展的角度研究现代哲学

肯定中国现代哲学是救国哲学，注意分析哲学思想的社会作用，必须正确处理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剖析政治思想是为了更好地剖析哲学思想。为了充分显示中国现代哲学的特点，必须明确中国现代哲学史是专门史，是哲学思潮发展史，而每一哲学思潮都是发展中的系统。

第一，正确处理哲学思想同政治思想的关系

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一再受到政治的干扰。当外界的因素逐步消除以后，哲学史工作者必须从自我精神禁锢中解放出来。其中之一就是要正确处理哲学思想同政治思想的关系。

首先，要真正从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去取舍研究对象。应该把一些与哲学关系不大的人物或派别从哲学史中删去。例如，二十年代的国家主义派，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现的中间路线派。这些是政治思潮或政治派别，在哲学上是微不足道的。而有些学者潜心于哲学研究，在哲学史上留下了业绩，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也应该给予足够的篇幅去剖析。

其次，坚决废止以政治态度进步与否和政治地位高低为出发点去褒贬哲学思想的习惯。

人们在政治上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爱憎，但那不应成为评论哲学思想的标准。不幸，近几十年来从政治上的爱憎出发臧否哲学思想已相袭成风。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哲学思想被竞相吹捧，某些粗疏的著作竟被说成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创造。而一些政治上有过劣迹的人物，对其哲学思想则贬抑唯恐不及。这种倾向的出发点无疑是非常善良的，但哲学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却被一笔抹煞了。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推论出来的结论，其可靠程度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

哲学归根到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是否有助于人们正确

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是否有助于人类或某一人类共同体（国家、民族等）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这是对某一哲学理论作价值判断不能不考虑的标准。政治思想的得失不应是评价某一思想家的哲学理论的主要参照系。因此，任何历史人物成为哲学史研究对象的时候都必须经受冷静的分析，以防止溢美或无根据的贬抑。

第二、以哲学思潮发展为线索去掌握中国现代哲学。

中国现代哲学史是一部哲学思潮更替史。任何哲学思潮的盛衰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与当时的社会矛盾、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发展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当一个新思潮出现的历史条件成熟以后，往往不是一个而是好些思想家表现了同一倾向，并对一部分甚至是范围相当广阔的各界群众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一时的风尚。如果说在古代由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节奏缓慢，这种趋势还时隐时现的话，在社会生活节奏和信息传播速度大大加快的现代，这种趋势就非常明显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从培根、笛卡儿、康德、达尔文、斯宾塞到詹姆士、柏格森和马克思，各种哲学思潮纷至沓来，此兴彼落，几十年间几乎重演了一番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史，中国人自创的体系也接连出现。

适应这种客观情况，笔者力求以哲学思潮发展为线索去掌握中国现代哲学。哲学史不可能离开对哲学家的理论的论述。但这个论述可以选取不同的角度。基于上述理解，本书是把具体的哲学家放在一定的哲学思潮发展的总体中去考察的。某一哲学家是特定的哲学思潮的代表，而这个思潮的代表常常不仅是一人。同时，思潮的兴替也有可以寻究的轨迹。作这样的探索自然遇到种种困难，也不可能一开头就做得很完善，但探索总比率由旧章更有乐趣。

第三，把一切哲学都看作发展中的系统。

“哲学是发展中的系统”；黑格尔提出的这个命题是非常深刻的。世界本来就是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系统。从纵向看，这个系统是发展中的过程。一个社会一定时期的哲学也是纵横交错的系统，其中不同哲学流派就是不同的子系统。哲学史应该如实地反映这些系统的发展变化。

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的唯物论者，明天可能走向唯心论；反之亦然。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对任何思想家都应仔细考查他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没有值得注意的不同。对一个思想丰富而又在发展变化中的哲学家来说，切忌把他不同时期的思想资料凑在一起去评述他的理论。也就是说，应该认真考查每一思想材料在一个发展中的系统里的地位。否则，一个思想家复杂的、多层次的面貌就会扭曲为简单的固定化的脸谱。

为了真正把哲学看成发展中的系统，避免上面提到的弱点，本书作了一个尝试，把一些哲学家的思想按照时期的不同，分别放在不同的篇章中去论述。这有利于把一个思想家的成就与不足都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纵向同自己和中国哲学的过去比，横向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比，在一个坐标系中记下他们的思想轨迹。运用这样的方法有可能令褒贬减少许多主观随意性。其不足是不能很快了解一个思想家的全貌。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各卷书后都附了人名索引。

同样，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发展中的系统，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讲发展的。可是，过去有一种错觉，似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正确的思想原则以后，发展就是对正确理论的补充和丰富而已。当重大挫折成为现实以后，曾经作过严肃的理论分析。但由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仍然缺乏系统、彻底的研究，有些重大问题似乎尚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例如，“左”的